

# 论司马迁的黄帝观

张茂泽

(西北大学 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陕西 西安 710069)

**摘要:**司马迁撰写《史记》,以黄帝为首,其中体现的黄帝观影响后世深远,值得专门研究。学界研究黄帝,多以司马迁的记载为基本材料,但目前尚未见到专门研究司马迁黄帝观的论著。根据司马迁《史记》文本,从材料出发,用历史学方法归纳、概括司马迁黄帝观的内容,分析和揭示其背后的历史背景和条件,有助于今人科学认识历史上的黄帝观。研究认为,在司马迁之前,黄帝只是神话传说,司马迁一变而为正史实录,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华文明起源的书写形式,完善了中华文明史系统;从司马迁描写的黄帝看,黄帝实有其人,有家有业,有家人,有后裔,而且有生有死,“黄帝崩,葬桥山”,传说中的人物由此变成了客观存在的历史人物。而和司马迁同时的汉武帝却惑于神仙方术,相信黄帝铸鼎飞升;司马迁的黄帝观以理性的描述内容,抑制了当时一些人神秘化历史人物的消极倾向。司马迁在描述中还隐含了道德史观在内,在他看来,黄帝之所以做出了杰出历史贡献,是因为黄帝“修德”;所以,司马迁表彰黄帝就在“彰明德”。这一观念,延续了西周以来的道德史观传统,更加凸显了道德在历史上的作用。

**关键词:**司马迁;黄帝;黄帝观;《史记》;汉武帝;道德史观;中华民族共同体;民族共同体意识

中图分类号:I207.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6248(2019)04-0051-09

## SIMA Qian's view of the Huang Emperor

ZHANG Maoze

(Institute of Chinese Ideology and Culture,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069, Shaanxi, China)

**Abstract:** SIMA Qian wrote the *Historical Records*, in which the Huang Emperor was considered the most important ancestor, and the concept of the Huang Emperor has a far-reaching impact on future generations and deserves dedicated research. Academic circles mostly use SIMA Qian's records as basic materials to study the Huang Emperor, but so far there have been no works specializing in SIMA Qian's view of the Huang Emperor. According to the text and based on the materials of SIMA Qian's

收稿日期:2019-04-15

作者简介:张茂泽(1965-),男,四川广安人,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历史学博士。

*Historical Records*, this paper uses historical methods to generalize and summarize the content of SIMA Qian's view of the Huang Emperor, and analyses and reveals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and conditions behind the view, which is helpful for people today to scientifically understand the view of the Huang Emperor in history. It is found that before SIMA Qian, the Huang Emperor was only a myth and legend. SIMA Qian changed the myth into an official historical record, which fundamentally reformed the writing form of the origin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improved the system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From SIMA Qian's description of the Huang Emperor, we can see that the Huang Emperor was a real person with residence, land, family and descendants, and that he had actually lived and died. "The Huang Emperor passed away, and was buried in Qiaoshan". A legendary figure thus became an objective historical figure. Martial emperor of Han dynasty in the same era as SIMA Qian, however, was obsessed with immortal magic and believed that the Huang Emperor had casted a tripod and flown up to heaven. SIMA Qian's view of the Huang Emperor suppressed the negative tendency of some mystifying historical figures at that time with a rational description. His description also implies the concept of moral history. In his view, the reason of the Huang Emperor made outstanding historical contributions was that the Huang Emperor "cultivated morality". Therefore, SIMA Qian praised the Huang Emperor in that he "promoted and exhibited morality". This concept inherited the tradition of moral history since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 and highlighted the role of morality in history.

**Key words:** SIMA Qian; Huang Emperor; view of the Huang Emperor; *Historical Records*; Martial emperor of Han dynasty; historical view on morality; community of Chinese nation; awareness of national community

中华文明5 000多年历史,从黄帝开始。由于时间相隔久远,黄帝和我们今天的具体历史联系,目前还有不清楚的环节、方面。比如,夏朝以后的历史我们大体清楚,黄帝到夏朝之间上千年的历史就不很清晰。中华文明起源问题,依然是世人关注的重大课题。黄帝文化研究,正可以作为其中一个专题加以研究,助力于中华文明起源问题的认识和解决。

我们现在每年清明公祭黄帝陵,研究黄帝文化,离不开我们对黄帝的认识,离不开我们的黄帝观。海内外十多亿中华儿女的炎黄子孙意识,暗含了黄帝观在内。我们今天对黄帝的看法,则深受司马迁黄帝观的影响。黄帝和我们今天相差5 000多年。我们相信这个说法,历史根据在哪里?关于中国史、中华民族史、中华文明史的源头,即关于黄帝问题,主要根据就是司马迁的记载。司马迁著《黄帝本纪》,是关于黄帝的主要史料,也是我们今天纪

念感恩黄帝,认同黄帝始祖地位的基本依据。可见,今天研究司马迁的黄帝观,对于我们准确认识和把握黄帝文化,树立正确的黄帝观,文明缅怀和感恩黄帝等先贤,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有积极意义的。

司马迁没有专门系统谈论黄帝。他的黄帝观主要体现在他《史记》首篇《五帝本纪》中的《黄帝本纪》中,也间接隐藏在《史记》的《封禅书》《孝武本纪》等材料中。史学家喜欢也善于寓论于史,论在史中,史中有论,论从史出。司马迁描述黄帝的历史,潜在表现着他的黄帝观念。他借助对黄帝一生实践活动的描述,诠释了黄帝身上暗含的丰富文化意义,展示了他对黄帝的看法。以司马迁《史记》为主,观察司马迁对黄帝的描述,揭明司马迁的黄帝观,有助于理解中华民族黄帝观的历史渊源,丰富我们黄帝观的内容。

司马迁所言关于黄帝的历史,是作为客观史实

来描述的。从史学著作角度看,有几个问题必须关注:史料的问题、内容的问题、宗旨的问题。即关于黄帝的史料有哪些,是否可靠,如何确立其可靠性?黄帝是人还是神?黄帝是什么样的人,做了哪些事,有什么样的历史贡献?司马迁描写黄帝,最重要的内容,或者说他这样描述的宗旨是什么?

## 一、关于黄帝的史料及其历史诠释问题

黄帝的史料及历史诠释问题即黄帝作为历史人物的可靠性问题。根据司马迁的看法,黄帝是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他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始祖,也是华夏族和许多少数民族的共祖,是中华文明的人文初祖。作为客观史实,必有史料佐证。

关于黄帝的史料又涉及以下几个问题。《黄帝本纪》的史料问题,是涉及关于黄帝的文献材料较少的问题,关于黄帝的文献材料是否可靠的问题,有关黄帝的文献材料,相互关系如何处理等问题。司马迁28岁做太史令,开始利用他看得见的原有著作、国家档案材料,编写历史著作。

司马贞《史记索引·序》言,有关黄帝的材料,“年载悠邈,简册阙遗”<sup>[1]</sup>。《史记索引·后序》云:“夫太史公记事,上始轩辕,下迄天汉。虽博采古文及传记诸子,其间残缺盖多。或旁搜异闻,以成其说。”又云:“太史公之书,即上序轩黄,中述战国,或得之于名山坏宅,或取之以旧俗风谣,故其残文断句难究详矣。”<sup>[1]</sup>意思是说,黄帝时代距今久远,留下的材料很少,而且阙遗甚多。后人认识黄帝,只能“旁搜异闻”,辅以“旧俗风谣”,以弥补材料的不足。旁搜异闻,类似轶闻野史;旧俗风谣,则源于实地调研。也就是说,司马迁研究黄帝,既搜集、运用了所有传世文献材料,含正史、野史在内;也调研、采录了社会调查材料。司马迁以文献和调查互证的方法,相互补正,拾遗补缺,进行判断。

用今天的眼光看,司马迁所能见到的文献材料,有以下3类:

其一,经传材料:《大戴礼记·五帝德》《孔子家

语·帝系姓》《易大传》等。

其二,史书记载:《世本》《国语》《战国策》《楚汉春秋》《左传》等。

其三,子书材料:《管子》《庄子》等。

司马迁自己实地调查所得的材料,多而重要。他在《五帝本纪》末自述说:“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於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sup>[1]</sup>(《五帝纪》)其实,司马迁足迹所至,比他在里说的还要广远。比如,南边,他不只是到了江淮地区,而且涉足今浙江绍兴、湖南永州道县、云南昆明一带,在今四川、湖北、安徽、江苏均有足迹<sup>[1]</sup>(《太史公自序》),真可谓行万里路。

司马迁自己还说,他要将这些实地调查材料,整理一番,以便让这些材料“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太史公序》)。他发现,调查材料“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所言内容,和经传、史、子所载往往“不离”。

可见,经传、诸子百家、历史书,以及野史、传说、实地调研所得,皆为司马迁描述黄帝的材料来源。在方法上,太史公采用了文献和调查材料相结合的证明方法。他将文献材料和实地调查材料进行比较,两相对照,可以互证,类似于近代王国维先生发明的二重证据法。司马迁确认黄帝史料可靠与否的方法,即使用20世纪的学术眼光看,也是有一定科学性的。

王国维曾经提出二重证据法研究历史,即地上文献和地下考古发掘的材料相结合。成中英也曾谈到三重证据法,即在二重证据法基础上加上实地调查材料。司马迁在2000多年前就使用了二重证据法,只不过是文献和实地调查相结合的方法,用以研究黄帝问题。这个方法后来顾炎武还用以研究经典,推动经学进入考据学的新时代。这些都说明,这个方法是有科学性的,所以能得到不少学者的认同和运用。

另外,《尚书》不记载黄帝,只是到战国时期才出现“百家言黄帝”局面,这就使“荐绅先生难言之”;孔子似乎谈及黄帝,但“儒者或不传”。这些问

题需要有合理的解释。就是说,既然黄帝是真实存在的,但为什么《尚书》不记载?为什么《论语》《孟子》《荀子》这些反映先秦大儒思想的著作却不及一言?这是需要说明的。

其一,战国中期,诸子并兴,百家争鸣。黄老异军突起,与儒家竞争激烈。各家学术思想分歧外,又皆“务为治”<sup>[1]</sup>(《太史公自序》),势必争夺思想文化领域的话语权。儒家树立圣王典型,就是尧舜禹。他们由夏商周三代而上溯到尧舜禹,以“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的禅让制美称之。道家本就以自然无为为宗,提倡清静自正,批判儒家的理想志向、政治关怀、礼法规矩、人本倾向等。战国中期时,一批现实主义的道家学者,适应时代需要,汲取儒法诸家思想,高标无为而无不为,表现出会通诸家的姿态。《老子》有“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等说,认为历史原本很美好,但后来却越来越坏。儒家为尊者讳,欲批判现实而不能,只能寄理想于远古历史描述中;在儒家那里,远古历史越美好,则现实便越坏。儒道学者的历史描述或美化,正是他们批判现实的表现;他们美称的历史,也是批判现实的依据、标准和理想。儒道历史观念有一个共同点,即越古老越近道,越悠远越崇高。这容易营造出一种特殊的历史文化氛围。在这种氛围里,人们竞相追溯远古历史,描述甚至塑造出尧、舜、黄帝等历史人物形象,作为推崇的道德理想人格。结果很显然,黄老道家的历史追溯和历史塑造,以黄帝为中心,在本根、祖脉上,在历史时长上,都压儒家尧、舜一头。今天我们已经很清楚了,用诠释塑造出来的历史为自己的主张进行理论说明,当然会受到严肃历史学家的质疑。但在史学不够发达而现实又有强烈需要时,黄老学者真诚相信,以黄帝为依据进行论证,可提供比儒家更强的说服力。

其二,战国中后期战乱频仍,而人心思安,国家统一为大家所期盼。战国中期兴起的黄老之学,无为而无不为,试图以道为核心范畴,会合诸家,而成一会通诸子的新型思想体系。在这个思想体系中,道是本原,儒家的德治或仁政以及礼仪制度,法家的以法治国等都是手段;无为是手段,无不为是目

的。道的本源地位,和黄帝的本根地位是相应的,都行进在一元论的理论道路上。

其三,秦朝横扫六合,一统天下,却二世而亡。西汉初年,“海内一统”<sup>[1]</sup>(《太史公自序》),汉承秦制,文景之治,并没有完全解决多民族国家的统一问题。景帝时期发生七国之乱,彻底暴露了国家统一的脆弱性。形势严峻,人们迫切需要找到办法,利用一切资源,维护和巩固国家统一。小农经济是小生产,家庭为基本生产单位,是农村公社的基层组织形式。多民族大一统政治局面难以获得这种经济形式的直接支持。国家统一的维护和巩固,只能从政治制度、思想文化方面着手。但汉武帝初即位,“窦太后治黄老言,不好儒术”(《孝武本纪》)。直到汉武帝亲政后,西汉王朝才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中央集权,地方则弱化封建侯国,强化郡县;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确立经学官方地位;以孝治天下,确立三纲五常制度和观念等。

同时,当时还出现了“尊黄”思潮,即尊崇黄帝的思潮。推崇黄帝、老子的道德家,汉武帝亲政后虽然不再是官方提倡的学说,但在学界和民间依然有强大影响力。在黄老之学指导下,西汉初年出现了“文景之治”的盛世,这对于吸引人们关注黄帝,提高黄帝文化的地位,扩大黄帝文化的影响,势必推波助澜,提供极强的现实说服力。《黄帝内经》《黄帝阴符经》等十几种假托黄帝的著作出世,如天神崇拜中的黄帝崇拜,都是“尊黄”思潮的集中表现。

汉武帝虽然表彰六经,但他也喜“敬鬼神之事”,求神君,言神事,受方士影响,深信黄帝益寿不死,铸鼎登仙,于是崇奉包括东南西北中五帝在内的黄帝。汉武帝沿秦直道北巡朔方,回来时,转道上郡阳周县(今陕西黄陵县)祭祀黄帝冢等。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著《论六家之要指》,贬斥儒家“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表彰道德家,也就是黄老之学于道为最高。黄老之学在汉初本来就占主导地位,其无为而治思想,不仅有文景之治的实践说服力,而且得到了各诸侯国的支持。因为无为而治被解释为君主无为、臣下有为,正适应了地方

各诸侯国分权自立,发展自身的需要。司马迁本有黄老的家学渊源。可惜他遭遇到七国之乱后的汉武帝,无为而治说被朝廷抛弃,儒家学说逐步确立统治地位。司马迁欲挽狂澜于既倒,努力用历史著作的形式,表彰黄帝,既表达了当时人们缅怀过去辉煌的情感,满足了当时人们追本溯源的精神家园需要,也未尝没有凸显黄帝,为黄老学张目的意思。同时他理性精神高昂,不赞成当时社会政治生活中流行的神仙方术为代表的神秘文化,反对将黄帝神秘化。

在司马迁那里,上述原因确实难以三言两语说清楚。换言之,这时,司马迁需要黄帝来弘扬道家学问。朝廷即使表彰六经,罢黜百家,在民族国家精神家园建设上,也依然需要黄帝作为一种国家统一、文化自信的符号,作为民族始祖、华夏旗帜而发挥维护巩固多民族国家统一的重要作用。前人未曾言,后人未必不可以言;前人未曾行,后人未必不可以行。这恰恰是历史创新的表现。司马迁将黄帝作为《史记》开篇,可谓重大史学创新。以他为代表,当时的人们高高举起了黄帝文化旗帜;黄老之学未必再兴,但在政治和精神家园建设上,却适应和满足了时代需要,发挥了正面积极作用。直接的后果是,黄帝作为中华民族始祖和共祖的地位,黄帝作为中华文明人文初祖的历史地位得以确立,黄帝作为华夏旗帜的符号意义开始呈现。

黄帝实有其人,这是历史事实,有客观性。对黄帝的诠释,黄帝生平的描述,黄帝血脉系统的构建,黄帝作为民族始祖、人文初祖、华夏旗帜地位的确立,虽然都属于后人对前史的诠释甚至构建,但也依然是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有其不可否认的客观性。只是其客观性的强弱,有赖于史家诠释方法的科学性或理性的程度。顾颉刚提出“层累造成”的历史,发现了其中的主观性因素;但是,也应注意,“层累造成”的历史中,也不完全是主观的东西,其历史价值不能一概抹煞。因为历史和历史叙述本来就是一体的,不可分割,更不能对立。没有历史的历史叙述当然是空话,不是历史叙述;但没有历史叙述的历史,也抽象难言,究竟是不是历史,也

很难说。历史必须通过历史叙述来表现,历史叙述就是叙述历史。故在文明起源研究中,因为资料不足,“层累造成”的历史,和本来的历史,难以截然分割,更不能截然对立。作为历史的一部分,后人理性的历史诠释,依然值得尊重,有进行历史研究的价值。有历史智慧的人们,能在历史真相基础上,对历史进行科学评价,结合时代变化,加以借鉴和利用,传承创新,推动历史进一步发展;借助社会生产生活实践,有意识地克服“层累造成”中的主观意义,促使其向前进展,更多地具有客观性,积累更多的理性因素,成为传承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 二、司马迁认为黄帝是人而非仙

司马迁《五帝本纪·黄帝本纪》原文如下:

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於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黑貔貅羆虎,以与炎帝战於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蚩尤作乱,不用帝命。於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

东至于海,登九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官名皆以云命,为云师。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万国和,而鬼神山川封禅与为多焉。获宝鼎,迎日推策。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以治民。顺天地之纪,幽明之占,死生之说,存亡之难。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旁罗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劳勩心力耳

目，节用水火材物。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

黄帝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人。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於西陵之女，是为嫫祖。嫫祖为黄帝正妃，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嚣，是为青阳，青阳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仆，生高阳，高阳有圣德焉。黄帝崩，葬桥山。其孙昌意之子高阳立，是为帝颡顼也。

司马迁《黄帝本纪》，除去今人用的标点符号，共493字。主要有几个方面：

第一，黄帝实有其人。司马迁描述了黄帝的生平，他的出生，娶妻生子，和炎帝是兄弟关系，和炎帝、蚩尤发生了两次战争，最终统一天下，并设官治理，建立起国家雏形，成为历史上首位天子。同时，黄帝“时播百谷草木”，发展农业，观天文历象，制定历法，披山通道，发展交通，发明众多生产生活器具，以及文字、医药、音乐、舞蹈等，又是中华文明的人文初祖。最后，他明确描述“黄帝崩，葬桥山”，点明黄帝并非像那些方士们所言而汉武帝相信的那样，铸鼎飞升，长寿成仙。正因为有伟大史学家司马迁为我们提供的这些历史要素，我们今天才能无障碍地肯定，黄帝是中华民族的始祖、中华文明的人文初祖、团结华夏儿女共同奋斗的光辉旗帜，黄帝陵是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

关于黄帝，传说很多，但《诗》《书》不载，缙绅难言。黄帝记载，由传说而正说，由野史而正史，黄帝本身，也由传说中的神仙，转化而为现实的人，司马迁功莫大焉。司马迁的描述，重在揭示客观史实，如裴骃言：“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sup>[1]</sup>（《史记集解序》）根据司马迁描述，后人从此知道黄帝实有其人，他有生有死，有先祖，有后裔，有家庭，有国家，完全是一个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在司马迁时，流行神仙方术。黄帝被认为铸鼎飞升，成为了神仙。司马迁却明确说：“黄帝崩，葬桥山。”黄帝不是铸鼎飞升成仙，而是驾崩了，安葬了，还有黄帝冢。这就是用理性认识发现的客观历史事实，廓清了当时笼罩在黄帝身上的方术迷雾，体现了司马迁高度的理性精神和勇于直言的史

家风范，凸显了黄帝文化中理性认识因素的积极意义。

司马迁在《太史公序》中表彰黄帝的巨大历史功绩和历史地位说：“维昔黄帝，法天则地。四圣遵序，各成法度。……厥美帝功，万世载之。”<sup>[1]</sup>（《太史公自序》）这就说明，黄帝不仅是人，而且历史地位崇高，是民族始祖兼国家始祖、文明始祖了。

第二，黄帝是始祖，也是汉朝时期各民族的共祖。黄帝之前有炎帝、伏羲、燧人氏、有巢氏等，何以历史一定要从黄帝开始写起？这体现了司马迁的非凡史识，里面隐藏着司马迁诠释历史的深意。

历史必须有开始，而黄帝作为开始，有最强的说服力。除了黄老之学的家学渊源、现实政治影响外，多民族大国的精神家园建设也需要祖先崇拜的大力支持。黄帝是华夏始祖，是颡顼、帝誉、尧、舜的祖先，也是夏朝人、商朝人、周朝人的祖先，当然更是秦朝人、汉朝人的祖先。黄帝还是汉帝国两大民族共同的始祖，北方匈奴就是有扈氏的苗裔，而有扈氏就是夏朝时期的一个部落，是大禹的后裔。这样，司马迁就树立起各民族的共同始祖黄帝，无疑有助于强化各民族的共同意识，为维护和巩固当时多民族国家的统一提供心理支持。同时，经过司马迁这样的诠释构建，宗法血缘的祖先崇拜，就超越了一家一姓“各亲其亲，各子其子”<sup>[2]</sup>（《礼记·礼运》）的局限，演变发展为民族国家的共同祖先崇拜，丰富和强化了各民族的共同意识。在祖先崇拜活动中，它也构成祖先崇拜从一家一姓的祖先崇拜，经民族、国家共同的始祖崇拜，上达天地乾坤大父母祖先崇拜的中间环节。这可谓中国古代祖先崇拜适应多民族统一国家的需要，构建古代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而发生的重大进展。

黄帝始祖地位的确立，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司马迁的黄帝观，不仅体现了他自己对中华民族根源、中华文明起源、中国起源的理性认识，也和“尊黄”思潮一起，曲折反映了当时西汉人民族国家意识的一般状况。它标志着黄帝作为古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sup>[3]</sup>的重要内容，开始确立起来，标志着黄帝作为团结华夏各族的一面旗帜，开始高高飘扬

起来。黄帝作为古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容,在民族国家意识上,至少在以下3个方面超越了前人,充实和丰富了汉朝人的精神家园。其一,和当时哲学上的宇宙生成论相应,国人祖先崇拜意识,发展为始祖崇拜,体现了当时人们已经意识到始祖根脉更有本根意义,更有包容性,文化意义重大;其二,和西汉以孝治天下的国策相应,“各亲其亲”的一家一姓式祖先崇拜,发展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sup>[2]</sup>(《礼记·礼运》),四海之内皆兄弟,天下一家、中国一人的大同意识;其三,和匈奴也是黄帝后裔的华夷一家意识相应,古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开始形成。

### 三、“章明德”

根据司马迁描述,黄帝是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将黄帝作为历史的开端,背后所隐藏的是什么深层意义?值得思考。

黄帝之前,还有伏羲、女娲、神农。黄帝同时也有炎帝、蚩尤,为什么就要确认黄帝是始祖?司马迁认为,他编著《史记》富有深意,“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司马迁这样写历史,“其意”是什么?也可以转换为这个问题:以黄帝为篇首的宗旨是什么?笔者认为,编织黄帝血脉传承系统,恐怕只是历史的表象,其更深沉的意义,应是“章明德”。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他的历史观其实是一种道德史观。故黄帝作为篇首,必提“修德”,这是点明历史主题。

他在《五帝本纪》中说:“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以章明德。故黄帝为有熊,帝颛顼为高阳,帝喾为高辛,帝尧为陶唐,帝舜为有虞。帝禹为夏后而别氏,姓姁氏。契为商,姓子氏。弃为周,姓姬氏。”这说明司马迁描述黄帝,虽然重视黄帝作为华夏部族血缘祖先的地位,但又不局限于此,而更强调血缘背后的普遍必然因素,这就是“修德”。

何谓明德?前人注解《史记》有言,德高而记述之,德薄而忽略之。黄帝德高,故得以记录入史。

其高德在何处?黄帝“修德振兵”,司马迁有明言。所修之德有哪些内容?司马迁全文描述的内容,当可视为黄帝所修之德的内容。

概括地说,黄帝站在中华大地,创造人类文明,带领华夏先民走出野蛮时代,跨入文明社会门槛,不仅造福当时民众,而且福荫子孙后代。黄帝事业宏伟,福德深厚。他的德是造福民众的福德,他的业是创造文明的伟业。他的福德通过他的文明伟业表现出来,他的文明伟业得到他福德的有力支持。后来儒家经典《大学》提出“明明德”,与亲民等修、齐、治、平事业相联系,不能说和黄帝的福德、伟业毫无关系。

具体看,黄帝的德业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带领民众发展生产(发展农业,发明劳动工具,掌握、积累天文历法等农学知识),改进民生(生活用具),造福民众。

第二,开展军事行动、除暴安良、救民水火、保卫和平、维护公平。

第三,足迹遍及中原,建立统一国家,创建国家制度,设官管理,维护社会稳定。

第四,创造文字、音乐、舞蹈等,发展文化,奠定中华文明基础。

第五,一生“未尝宁居”,勤政爱民,成为后来治国者的榜样。

第六,黄帝的子孙繁衍为中华民族,黄帝创造的文明发展为中华文明,黄帝本人也成为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福佑中华民族成为全球人口最多的民族共同体,福佑中华文明成为唯一没有中断自然发展进程的人类文明。轩辕黄帝带领先民认识改造洪荒世界,大力创造文明,为后来中华文明的繁荣昌盛打下了坚实基础。黄帝时代的先人们用自己的智慧与双手,向人类未知的领域挺进,成功解决了人类在文明初创时期严峻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在黄帝带领下,中华文明无比从容地迈出了第一大步,为中华文明光辉灿烂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司马迁记载周人兴起的材料,可以作为“德”包含发展生产的意义的旁证材料。他记述周人祖先

后稷发明农业,使周人可以定居生活,认为后稷“有令德”<sup>[1]</sup>(《周纪》);公刘继承后稷事业,发展农业生产,使周人居有储蓄,行有资粮,当时的诗人“歌乐思其德”<sup>[1]</sup>(《周纪》)。

联系到《尚书》“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说,即上天根据民心民意确立君王是否有德的思想可知,司马迁此说是有渊源的。

问题是,何以发展农业生产就是有德?原来,古人讲一个人是否有德,关键在他人的评价。他人评价一个人是否有德,并不空洞。治国者发展生产,提高了民众的生活水平,老百姓得到了实惠,自然高兴。老百姓饮水思源,会发现是治国者给予的恩惠,故称这种恩惠为恩德。因为得到这种恩德,故能反过来赞颂治国者有德。在治国理政活动中,道德的逻辑运动模式是:治国者发展生产——提高民众生活水平——民众得到实惠——民众称这种实惠为恩德——民众反过来赞颂治国者有德。

根据这种德治模式,为政以德,以德治国,固然强调治国者以身作则,进行道德教化,但其中的“道德”,却有两个根本标志,值得注意:

其一,道德,必然与社会生产发展有关,和民众生活实惠有关,和民族国家的组织制度、社会和谐、民众安全的实践活动紧密相连,而不只是道德概念的抽象运动,不只是源于西学的伦理道德,不是和认识、审美、政治经济相分离的,单一抽象的伦理道德。讲道德而离开生产生活,离开科学、艺术,或者重视生产生活、科学、艺术而忽略道德修养、道德教化的作用,我们都是有教训的。我们要意识到,在中国古人那里,道德是文明、人性的同义词,它们有相同的外延;区别和联系在于,人性是内在基础和前提,文明是外在表现和结果,而道德、事业则是人们在生产生活中,使道德和文明结合的枢纽。

黄帝时代是中华文明的奠基时期,黄帝“修德”,表明以黄帝为代表的华夏先民,创造奠基中华文明,实在是因为他们内有修德而外有事业,道德和事业互相统一,道德修养是做好事情的基础;这实际上是当时华夏先民人性的自觉、确证的初步,这也是后来中国哲学思想上儒道各家人格学说的

历史基础。

其二,一个人道德的有无,由他人,特别是由老百姓说了算,决非自己或少数人说了算。老百姓才是一个人有无道德的评价主体。

另外,司马迁说黄帝“修德”,如何“修”的?后来《庄子》书中有些说法不一定可靠,但也不能说完全无据。因为《庄子》一书多为寓言,可能不都是事实。我们可以这样思考,黄帝有厚德大业,则必然有修养。只是他如何修养的,由于史料阙如,我们今天已经难以尽知、难以言说。

为什么肯定黄帝必然修德?有什么依据没有?因为从历史上看,道德从来不是自然发展进步的;从人生历程看,一个人的道德从来不是自发成长、提高的。换言之,道德绝不是本能冲动自发的自然物,而是理性自觉的文明产物。仓廩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道德会受到物质生产生活进步的影响。生产力进步,生活水平提高,人类愈益接近文明水准,理应越来越有道德。但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并不尽然。在历史长河中,每个人的道德并没有自然进步;在个人人生历程中,每个人的道德并没有自发提高。这是为什么呢?照古人见解,这是因为道德的产生、提高,是人性修养的产物,而不是自然诞生的东西。

根本原因在于:

第一,道德是人,社会的人适应自身生存发展需要的产物,是人的需要实现、欲望满足的前提和保障。荀子礼有三本说中,礼是对人欲望的节制,是规范和欲望相持而长,保持平衡的产物。道德和欲望同生共长。欲望自发产生,自然生长;与此不同,道德则是理性的产生、理性地成长的。

第二,道德是真理的现实表现,是真理在人生中的实现,也可以说是人本性的自觉和实现。道德需要努力才能具备,这个努力就是理想的树立和实现;换言之,就是修养,故谓为道德修养;提高了道德修养,理想的实现就有了坚实基础。

第三,道德是良知、真我自觉和实现的表现。一个没有良心的人,他不可能有真正的道德。一个人没有致过良知,他即使有道德也是假的,经不住



现实生产生活的考验。

生产生活,满足欲望,自觉挺立良知,认识运用真理,都在社会实践中进行,都需要在社会实践中进行修养努力,方能有得。历史可以自然发展,但道德不能自发提升,必须修养,人才能成为真正的、理想的人。这是后来儒道佛三家的共识。

也可以说,儒道佛这一共识,有重大历史意义:一方面,这是对黄帝“修德”文化的丰富和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就实践而言,这一共识正是社会生产发展、历史进步的根本推动力。在今天,这正是中华优秀道德传统中的精华部分,是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可缺少的必要内容,今天应大力传承,进一步弘扬广大之。

## 四、结语

黄帝和我们今天的联系有哪些?概言之,根据司马迁的黄帝观,黄帝实有其人,而非神灵、神仙。他是华夏族和许多少数民族的始祖和共祖,是中华文明的人文初祖。这是说黄帝和我们炎黄子孙有

血缘联系,黄帝后裔代代相传,连绵不断,炎黄子孙身上大都流淌着黄帝的血缘基因。他创造的文明(如农业、文字、国家等)是中华文明的奠基,和今天中华文明(汉语言文字、多元一体和而不同思维方式、多民族大国治理等)的复兴有历史联系。他创造文明的核心因素,在于“修德”,这和中华民族非常重视道德修养的传统有密切联系。中华民族重视道德,一脉相承,一以贯之。我们今天传承和弘扬“修德”传统,在“修德”基础上搞好民众生产生活等等,正是黄帝文化在5 000多年后的公元21世纪继续发展的表现。

### 参考文献:

- [1] 司马迁.史记[M]//佚名.二十五史:第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
- [2] 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M]//阮元.十三经注疏: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0.
- [3] 张茂泽.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及其历史基础[J].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20(4):1-3.